

國技的重量——一九六〇年代末期

少棒熱相關報紙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初探

倪仲俊*

摘要

本文以一九六〇年代末臺灣「少棒熱」——包括紅葉少棒隊因擊敗來訪的日本少棒明星隊以及金龍隊榮獲世界少棒賽冠軍所引發的群眾狂熱——延燒期間與少棒競技運動相關報紙新聞之論述進行耙梳，分析其中的國族主義話語，以一種微觀理解，去說明在少棒熱的過程中、棒球競技活動與國族意識或想像的發展之間的邏輯關係是如何初步被建構的。本文的研究指出，從少棒熱伊始，相關的新聞報導就確實充斥著國族主義的情緒與話語；而在這些話語中，則指向同一個「中國人」的主體想像。同時，考察這些國族主義話語的論證脈絡，並非是植基於一種對於國族問題的全新理解，而是延續了過去源自於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對身體文化的認知，適因新的社會情境的發生而大量地被重新生產。

關鍵字： 少棒運動 國族想像 紅葉少棒隊 金龍少棒隊

*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of the Newspapers' Reports and Comments on Little League Baseball in the Late 1960s

Ni, Chung-chu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of the newspapers' reports and comments on games and achievements of Taiwan'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sport in the late 1960s while the Team Hongyie defeated Japanese All-star Team and the Team Jinlong won the champion title of the 23rd Little League Baseball World Series. Then, it explains how the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those baseball ga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ist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s was initially constructed. There are two major conclusions. The first, at the beginning of Taiwan'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fervor there were lots of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infiltrated into the relative reports and comments of newspapers. Within those discourses, only one imagined subject, Chinese, was found. The second, the arguments of those discourses are not theoretically built on a new perception of the nationalist problems. Instead, they represented the same recognitions and contexts, which origina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the body culture and just reproduced when a new social condition happened.

Key words : little league baseball, national imagination, Team Hongyie, Team Jinlong

國技的重量——一九六〇年代末期

少棒熱相關報紙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初探

倪仲俊

一、前言

棒球運動做為一種「國家運動」、或曰「國球」的地位，此時此刻早已受到此間的官方肯認。至於棒球運動之「國球化」過程，則始諸當年少棒熱時期的「少年棒球運動」被認知為一種「國技」，¹並且引發時人發展「棒球王國」的想望。²但是，此國球之「國」究竟何指，卻頗曖昧。由是，在棒球運動國球化過程中的一些與棒球運動相關論述中的國族想像軌跡，正好用於旁證自二戰結束迄今在臺灣的人們其族群想像之轉換與發展過程。

事實上，棒球之為一種運動競技，而「運動」與族群建構之間的聯繫，早已受到運動社會學或文化研究的學者的關切。有學者則直接將此一論題直接連結至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初構的以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或族群符號模式(ethnosymbolic paradigm)之國族主義形態學範式。霍布斯邦原就以為運動是建構與表現國家認同的一個場域。³安德森同霍布斯邦一樣，認為國族是一種文化的人造物，也以為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形成是一個集體認知過程，但他不同意霍布斯邦以為「國族係人為虛構、捏造、發明、或創造出來的」的觀點，而強調國族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想像(imagining)」出來的。由是，安德森把國族定義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被

¹ 這種官方肯認，最早來自二〇〇一年五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訂定的《中華民國棒球振興計畫方案》中指「棒球乃我國國球」。同年十一月，陳水扁總統在接見日本巨人職業棒球隊前監督長嶋茂雄時，也公開指陳：「棒球是台灣的全民運動，也是我們的國球。」（〈總統接見日本職業棒球讀賣巨人隊終身名譽教練長嶋茂雄〉[總統府新聞稿]，2001.11.12，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issueDate=&issueYY=90&issueMM=11&issueDD=12&title=&content=&_section=3&_pieceLen=50&_orderBy=issueDate%2Crid&_desc=1&_recNo=3。）現任的馬英九總統於二〇〇九年四月六日接見世界棒球經典賽中華代表隊時，也表示：「棒球是我國國球」。（〈總統接見參加世界棒球經典大賽中華成棒代表隊新聞稿〉，2009.4.6，<http://www.sac.gov.tw/news/news-1.aspx?No=700>。）

² 佚名，〈再接再厲開創新局，爭取棒球王國榮譽〉，《自立晚報》，1969年8月25日，第五版。

³ Hobsbawm, Eric, *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但卻有主權的共同體。⁴據此定義，馬圭爾(Joseph Maguire)等進一步指出，運動競技係是「想像的共同體」最主要的指標和象徵物之一，因為它能夠得到超越政治範疇的文化性、宗教性、和公民性等特質，透過認同這些特質，進而使族群內部成員能夠產生一種歸屬感以及對於他者(the others)的差異感。⁵

本文基本上同意安德森對於國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的定義，並且認為臺灣棒球國族化過程的案例，正足以說明運動競技的成果如何被工具化地運用去成就特定的國族想像。至於研究史料之取徑上，本文同得益於安德森有關印刷資本與國族主義之關係之分析：渠以為包括報紙、小說等印刷資本的盛行，使特定族群內的知識菁英得以交換彼此的想像內容，方使一個與原族群平行的、共時的族群想像之成立得而可能。此亦所以本文選擇報紙之新聞論述為研究對象的主因。本文即以一九六〇年代末臺灣「少棒熱」延燒期間與少棒競技運動相關報紙新聞之論述進行耙梳，分析其中的國族主義話語，以一種微觀理解與說明：在少棒熱的過程中，棒球競技活動與國族意識或國族想像的發展之間的邏輯關係是如何初步地被建構的。

研究的具體事件指標有二。一是一九六八年以紅葉國校少棒隊擊敗來訪的日本關西明星少棒隊為高潮的紅葉熱潮。二是一九六九年，以臺中金龍少棒隊為名的中華少棒明星隊得到世界少年棒球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冠軍引發的金龍熱潮。而這篇小品研究名之為初探，亦有期待能以此成果，為將來進一步研究後來三級棒球熱、和成棒熱中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時，提供可比較的基礎。

二、一樹紅葉壓櫻花：紅葉少棒傳奇與當時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

一九六八年紅葉國校少棒隊所創造的連串傳奇故事，長期被認為是臺灣近數十年來棒球運動發展的重要關鍵。當然，故事的高潮是紅葉少棒隊於當年八月下旬連續兩次擊敗來臺訪問的日本關西明星少棒隊，但早在此項賽事之前，紅葉少棒隊早就在國內棒壇因彪炳戰績而有知名度。

紅葉國校位於臺東縣延平鄉的紅葉村，當地係一原住民布農族的部落；該校棒球隊的成員，亦皆為原住民的兒童。紅葉國校棒球隊的成立，可溯及一九六三

⁴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pp. 5-6.

⁵ Maguire, Joseph, Grant Jarvie, Louise Mansfield, and Joe Bradley, *Sport Worlds: A Soci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pp. 137~138.

年，由於物資缺乏，該隊成員往往只能以石為球、以棍為棒進行訓練；⁶該隊自一九六四年起征戰島內，迭有佳績，總共贏得三次全臺灣比賽的冠軍。⁷這種在刻苦環境下艱辛成長的故事，也是紅葉少棒受到矚目的原因。尤其是一九六八年五月間，紅葉少棒隊因旅費短絀，幾無法赴臺北市參與即將到來的第廿屆全省學童棒球賽，幸得外界捐款方得成行。與此故事有關的報導在當屆比賽前佔據了體育版面，遂使紅葉少棒成為當屆比賽的主角。⁸這個故事，隨著一九六八年五月廿一日紅葉少棒在決賽中以二 X 比一擊敗了來自嘉義的垂陽國校少棒隊，贏得冠軍，而達到了第一波高潮。在這波高潮中，紅葉的故事引發了社會輿論廣泛的討論，甚至還有三家電影公司原擬計劃將紅葉少棒隊的故事搬上銀幕，可見當時情況之熱烈。⁹

但，紅葉少棒隊的傳奇故事，並未隨著這座全省比賽的冠軍杯而告終。

一九六八年八月下旬，臺灣省體育會邀請了一支來自日本、由關西地區所選拔出來少棒明星隊來臺灣進行訪問比賽；在訪臺的過程中，這支明星隊總共比賽了五場，通算取得二勝三負的戰績，計敗給紅葉少棒隊兩場、中華聯隊一場(該聯隊成員中亦有六名為選自紅葉少棒隊的主力球員)。其中，在八月廿五日於中日少棒友誼賽的第二場比賽中，紅葉少棒隊以七 X 比零的比數擊敗日本少棒明星隊；由於這是第一次有國內的少年棒球隊擊敗來自日本的少年棒球隊，更何況長久以來日本被視作亞洲的棒球王國、該國的代表隊又甫連續兩年獲得世界少棒聯盟的世界少棒賽冠軍——即使這次訪臺的球隊並非世界冠軍隊成員——此一一系列的勝利，自屬意義非凡。當比賽勝負已定，不但在現場觀二萬餘觀眾掌聲與歡呼聲「響徹雲霄」，¹⁰同時，也因為電視轉播比賽的全場實況，而引起了全臺轟動。¹¹當然，各報紙媒體也推波助瀾，皆以大版面的篇幅鉅細靡遺地報導比賽的過程與場邊花絮。後來，隨著中華聯隊暨紅葉少棒隊接連再捷，更使國內球迷為之沸騰：不但每場比賽現場擠得水洩不通的觀眾，對於球員的表現興奮不已，將小球

⁶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第二十屆全省學童杯比賽揭幕當天，《聯合報》的體育版就以該報記者王景弘通題的〈台東紅葉國校棒球隊，獲得熱心人士資助，終於北上角逐錦標〉、與〈不斷耕耘，必有收穫〉的兩篇報導作為頭條，所佔篇幅遠遠比報導比賽揭幕的消息來得大。

⁷ 這包括了一九六六年的第十八屆全省學童杯冠軍，與一九六八年的第一屆全國秋茂杯冠軍及第二十屆學童杯冠軍。

⁸ 趙慕嵩，〈紅葉凌霜記〉，《聯合報》，1968年8月28日，第三版。

⁹ 雖然這三家電影公司先後放棄了拍攝計劃，但紅葉少棒的故事仍然在一九八八年被學甫電影公司加以改編，拍成電影《紅葉小巨人》一片。

¹⁰ 趙慕嵩，〈流星棒·追雲腿·紅葉翻飛〉，《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第三版；佚名，〈紅葉棒隊不負眾望，以七比零大勝日隊〉，《中央日報》，1968年8月26日，第三版。

¹¹ 臺灣電視公司轉播該場比賽，原來應是基於商業考量。據前臺視主播盛竹如的回憶：「由於[紅葉少棒隊被]烘托得如此熱門，電視公司決定要連續實況轉播兩場紅葉隊和日本少棒隊的比賽。」(盛竹如，《螢光幕前：盛竹如回憶錄》，臺北市：新新聞周刊社，1995，頁58。

員視作英雄，許多觀眾甚至當場從看台上向球場內拋灑鈔票獎勵小球員；¹²在比賽後，各界對於球隊的邀約也絡繹不絕。

只是，當時在紅葉傳奇故事的背後，存在有一些積非成是的誤解、抑或不為外人道的情節。其一，當時來訪的日本球隊並非當年、或前一年獲得世界少棒聯盟冠軍隊的成員，而係自日本關西地區球員所選拔出來的明星隊。但是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這支來訪的球隊卻經常被傳誦為係前一年獲世界冠軍的和歌山隊。就這一點，當時確有若干媒體有報導寫作失真與語意模糊之處，將「其少棒隊曾經獲得世界冠軍的日本所選派來訪的一支少棒明星隊」過份簡化，導致以訛傳訛，實難辭其咎。¹³其二，當時紅葉國校少棒隊總共十三個成員中，就有九個在事後被查出的確涉及冒籍，而冒籍原來是為了遮掩超齡的事實；¹⁴這就使比賽失去了應有的公平性，更何況當時原來是打硬式棒球的日本明星隊來臺已經客隨主便地改打陌生的軟式棒球、並遷就地主的規則。如今，隨著事實又被逐漸被重新廓清後，這些當時的誤解、或隱而不彰的不公平性，正回頭侵蝕紅葉傳奇原有的光環。¹⁵甚至，有論者並因此質疑官方有刻意誤導或隱瞞之處。然而，在檢視了紅葉熱潮前後的新聞報導中，來訪的日本少棒隊非之前世界冠軍隊的事實、以及後來紅葉國校校方人員因偽造學生的學籍資料而遭司法處分之情事，各主流報刊都有加以披露報導。¹⁶由於見諸報端的報導皆屬於公開資訊，要說官方有刻意隱瞞資訊以成就紅葉傳奇並使國族價值得以依附的論證，並不成立。

事實上，如果耙梳當時各報紙相關的新聞評論，其對於紅葉隊暨中華聯隊擊

¹² 趙慕嵩，〈流星棒·追雲腿·紅葉翻飛〉；何凡，〈紅葉戰勝以後〉，《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第九版。

¹³ 舉隅而言，如《中央日報》記者王宗蓉的報導就指陳一個位於臺東的資源及人口都有限的山地村落「竟然培養出一支實力強勁得擊敗世界冠軍的日本代表隊」（見：王宗蓉，〈愛心栽培的球隊〉，《中央日報》，1968年8月28日，第三版）；筆者於引號內所引述的文字就屬一段語意模糊的文字，既可以解讀為紅葉隊就是擊敗那支曾獲世界冠軍的日本代表隊、也可解讀為紅葉是擊敗由當時是世界冠軍的日本所來的一支代表隊。

¹⁴ 何振奮，〈紅葉飄零其情可憫，法曹尋求救濟途徑〉，《聯合報》，1968年9月10日，第四版。

¹⁵ 但直至如今，也仍還有一些記者以及棒球文字工作者仍持續為對紅葉少棒隊的質疑緩頰。前《民生報》記者王惠民所撰寫的《紅葉的故事》就指出：其實日本及紅葉雙方都有派遣超齡的選手。此得以論證雙方有相同的立足點。（王惠民，《紅葉的故事》，臺北市：民生報，1992。）著名球評曾文誠則於其專欄文章〈另一頁紅葉〉寫道：「因為即便是有這麼一段『歷史的瑕疵』，應仍無損於紅葉在台灣棒球史的地位，以石當球的苦練精神，曾感動多少台灣人民，那大敗日本『世界冠軍』的過程，又鼓舞多少台灣人民的自尊心，那萬人空巷的比賽盛況又是激勵多少台灣少年參與棒球運動的熱情，更別提因為紅葉的勝利，才讓我們有信心地踏出台灣向外挑戰的一步，也才有爾後三級棒球的狂熱。」

¹⁶ 有關來訪日本隊的實際情況，可參見該報導：孫鍵政，〈日少年棒隊，實力剖視〉，《聯合報》，1968年8月21日，第六版。至於有紅葉隊職員的訟案可參見：佚名，〈紅葉垂楊棒隊，被人檢舉冒名〉，《聯合報》，1968年6月18日，第四版；何振奮，〈紅葉飄零其情可憫，法曹尋求救濟途徑〉；佚名，〈紅葉棒隊訟案，引起各界關懷〉，《中央日報》，1969年9月10日，第三版。

敗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之意義的評析，仍然將核心的關懷置於這一系列的勝利對於未來國內棒球運動發展的可能影響上，並提出建言。原來，主辦單位臺灣省體育會辦理這項賽事就帶有測試國內棒球實力的用意，並將視比賽的結果來考慮是否未來將進一步參與國際賽事。¹⁷因此，紅葉隊暨中華聯隊勝利的原始意義，就應該是因此強化了國人對於國內球隊能力的自信，並對國內棒球運動的發展產生了樂觀的期待。舉隅言之，《中央日報》的報導中就指陳，據日本少棒明星隊對抗紅葉隊及中華聯隊「均告慘敗」的結果，「已經證明了我國少年棒球水準，已凌駕於當今國際水準之上」；¹⁸之前，該報也引述當時的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總幹事、也是臺灣省體育會理事長謝國城的話，「有了這樣優秀的幼苗，未來我國成人棒球運動將可以在國際棒壇上出人頭地」。¹⁹《聯合報》的報導則以為名震遐邇的紅葉隊迫使日本代表隊「俯首稱臣」，證實其「技術與實力達到國際水準」；²⁰並呼籲支援紅葉隊「向世界挑戰，向國際進軍」。²¹《民族晚報》的評析則以紅葉隊已「足以和棒球王國日本的少年水準，一較短長」，而這不只是一個「結果」，只是一個「起點」。²²該報的記者特稿中也強調：紅葉的大獲全勝「也給國人帶來了無比的振奮和信心」；²³只是，這種「信心」，仍是針對棒球運動的發展而發。

有一個事實，必須在此提出：在一九六八年的紅葉熱潮階段，國內報紙的新聞論述，並未將紅葉隊暨中華聯隊的系列勝利有系統地聯結到整體國族的前途——這和之後當金龍少棒隊獲世界冠軍時、報紙新聞論述的操作顯有不同。只雖然如此，有些在紅葉熱潮當時相關的新聞論述中反應出其背後的國族想像，卻值得筆者再加以分析。

首先，在建構紅葉隊擊敗日本明星隊此一事件與國家之棒球運動發展間的邏輯關係時，此國家主體為何？本來，日本少棒明星隊訪臺的賽事就以「中日少棒友誼賽」為名，且地主派出的菁英球員聯隊又名之「中華聯隊」，這樣的名稱早就提供了一個清楚的主體以供群體去依附其認同。部分媒體的論述則在行文之間又清楚地提出一個與符合當時官方思維一致的「中國」主體指涉。如《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的前身）就指出，來訪的日隊「實力猶在當曾獲世界少棒盟主的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之上」，中華民國的紅葉隊能以優異的戰績擊敗實力雄厚

¹⁷ 孫鍵政，〈中日少年棒賽，意義深遠〉，《聯合報》，1968年8月19日，第六版。

¹⁸ 佚名，〈中華棒隊再度揚威，擊敗日少年明星隊〉，《中央日報》，1968年8月28日，第三版。

¹⁹ 蘇玉珍，〈「魔手」發揮威力，胡武漢扼殺日攻勢〉，《中央日報》，1968年8月26日，第三版。

²⁰ 佚名，〈世界勁旅·首次「俯首」日棒球隊·一「葉」知秋，同心棒·連擊全壘打 紅葉隊·槓上大開花〉，《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第三版。

²¹ 佚名，〈好「棒」啊！〉，《聯合報》，1968年8月26日，第三版。

²² 民族晚報社（社論），〈紅葉一舉天下知〉，《民族晚報》，1968年8月26日，第二版；佚名，〈紅葉隊要得！〉，《民族晚報》，1968年8月26日，第二版。

²³ 張守卿，〈全壘打擊出滿園花，四歸四球壇稱盛事〉，《民族晚報》，1968年8月28日，第二版。

的客隊，「此顯示我國少年的棒球水準已進入國際領域」。²⁴在該報記者的特稿中，又指「一樹紅葉，給中國的棒壇帶來了滿懷的希望」：「長江後浪推前浪，中國球運始終不能在國際上嶄露頭角，……我們希望以『紅葉』的幼苗開始，好好地培養他們，使能刺激中衰的球運，在國際間放出光芒」。²⁵

其次，紅葉少棒隊員做為少數族群的原住民——按當時的行文習慣，則稱為「山地人」——身份，一方面被強調以強化紅葉的刻苦形象。例如《台灣新聞報》的報導就描寫道，「紅葉棒球隊從苦鬥中一鳴驚人、小將們的吃苦精神可嘉，領隊教練的培植，心血沒有白費，這十多位山地小將的家長們亦感光榮。」²⁶另一方面，他們的成就卻被視作是當地主流族群成就的一部分、而被運用去進行族群的內部動員。就在當年八月廿八日的《台灣新聞報》第二版刊出了一張賽前中華聯隊成員拉著中華民國國旗的相片，之上則由報社的編輯人員以斗大的鉛字加註標題：「大漢旌旗·人唱凱歌」。²⁷這個標題，反射出了當時臺灣主流社會的漢人中心情結。事實上，中華聯隊的成員有六名選自紅葉隊的原住民球員；這樣的標題，無異使得當時這些原住民運動員的成就被想像成為主流的漢人社會的成就之一部份。我們如果檢視《台灣新聞報》當時的相關新聞處理，可以發現其論述的思維脈絡與其它報紙非常接近：除了該有的比賽過程及花絮報導之外，也論述道：「紅葉隊能以懸殊的比數擊敗[日本少棒明星隊]這支世界第一流水準的勁旅，可見紅葉隊已高躋了世界水準」；同時，該報也論證了紅葉隊的這次勝利「更加強了我們的自信心」去發展體育活動。²⁸但是，就在該報一篇題為〈紅葉獲勝的啓示〉的方塊文章上，該作者一方面批判國人已深深地養成一種自輕觀念，「尤其在體育運動方面，自承病夫後裔，祇有敬陪末座的份兒」，另一方面則有所期待，呼籲「黃帝子孫，休得自輕」。²⁹此文顯然先是把「土生土長」的紅葉隊員(文中還另外提到了另一位之前在國際田徑比賽有輝煌成績的臺灣原住民運動員楊傳廣)想像成「我群」的一部分，然後又把這個「我群」想像為「黃帝子孫」；由是，原是南島語族布農族的紅葉少棒隊成員就與「黃帝子孫」的想像身份產生了聯結。

其實，這一種將所謂的「山地人」與臺灣主流的漢人族群——或是筆者下一節要探討的所謂中華民族——想像為一種同源的「同胄」關係，在當時的主流社會並不足為怪，只是反應了當時臺灣的主流社會所有的一種集體想像。臺灣的南島語族族群被正名為「原住民」係一九九五年憲政改革以後的事情——這體現

²⁴ 佚名，〈紅葉不負眾望·擊敗日本雄師！〉，《徵信新聞報》，1968年8月26日，第三版。

²⁵ 胡爾剛，〈一樹紅葉壓櫻花·萬丈光芒耀彩霞〉，《徵信新聞報》，1968年8月26日，第三版。

²⁶ 揚發，〈舐犢情深〉，《台灣新聞報》，1968年8月28日，第三版。

²⁷ 佚名，〈秋風起兮紅葉丹霞燦蔽日，少年棒賽破客師所向無敵〉，《台灣新聞報》，1968年8月26日，第二版。

²⁸ 台灣新聞報社(社論)，〈從紅葉隊的成就談起〉，《台灣新聞報》，1968年8月27日，第二版。

²⁹ 佚名，〈紅葉獲勝的啓示〉，《台灣新聞報》，1968年8月27日，第二版。

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文化多元主義產生對臺灣的影響以及回應了原住民復振運動的訴求。在此之前，從一九四九年以降，對臺灣高山原住民族的官定稱謂就是「山地人民」或「山地同胞」，原來的目的是為了彰顯政府以保護扶植、以及同化爲主的少數民族政策。³⁰這樣的名稱雖然看似有去「歧視」之意，但這樣的稱謂仍然反應出彼此族群的差異性的事實，而差異性形成的文化震盪與鴻溝，正是「山胞」認同被污名化的原因之一。而以上「山地行政」中所推動的「同化」或是「山地平地化」政策，則又不脫過去傳統文化主義「以徠遠人」的王道思維；這類以「近代化」、或「涵化」爲名的同化政策，在一九五、六〇年代後期得到一些理據支持，例如，人類學家凌純聲當時就認爲東南亞的南島系古文明發祥於華南的兩湖地區。³¹這種對南島語族祖族群發展的時間與空間的學術研究，後來被廣泛引證去論證漢族群或中華民族與臺灣南島語族原住民的同源想像。³²事實上，之所以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將日本殖民時代所慣用的「高山族」一詞改正爲「山地同胞」，本來就另有一種將原住民想像成與漢族爲同源族群的隱喻，以營造一種如阿瓏索(Ana Maria Alonso)所指陳的「隱喻的系譜」(metaphorical genealogy)，透過將國族內部成員想像成一個依附於親族紐帶而維繫的團體，而產生其內部休戚相關、形同一體的假象。³³

所以，將紅葉隊的成就與「黃帝子孫」進行邏輯聯繫，實具有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的政策與想像意涵。而這種比附，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也就司空見慣了。

三、海外揚威，歡聲雷動：金龍少棒奪冠熱潮時新聞論述中的國族主義話語

一九六九年八月廿四日，一支甄選自臺灣全島各地之菁英球員所組成的少年明星棒球隊，以「臺中金龍少棒隊」的名義，獲得了世界少棒聯盟第廿三屆世界

³⁰ 根據〈臺灣省政府山地施政要點〉(1951年6月30日)的前言：「根據三民主義及政府基本決策，針對現實，本平等原則，增進山胞之智能，扶植山胞之進步。」又，在融合層次上，除〈臺灣省政府促進山地行政建設計劃大綱〉(1953年12月14日)中已標舉了「山地平地化」政策外，〈臺灣省政府山地行政改進方案〉(1963年9月3日)則又有以下基本政策：「基於三民主義種族平等之基本國策，繼續保護扶植山胞，積極發展教育與經濟，以提高其文化經濟水準，增進其社會福利，促使早日與一般社會融合」。

³¹ 凌純聲，〈東南亞古文化研究發凡〉，《新生報民族學·研究專刊》，第四期，1950；凌純聲，〈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學術季刊》，1:2，1952，頁36~52。

³² 舉例而言：〈臺灣山地文化的特質〉，載《中央月刊》，10:5，1978；林衡道，《臺灣歷史民俗》，臺北：黎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pp. 198~199。

³³ Alonso, Ana Maria, "The Effects of Trut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 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1, pp. 33-57.

少棒賽的冠軍榮銜。在此之前，這支球隊集訓多時，然後在當年七月底赴日本大阪參與太平洋區的資格賽，先後擊敗關島與日本的代表隊，取得資格；然後，「臺中金龍少棒隊」滿載了國內球迷的期望，遠渡重洋，到美國賓州的威廉波特(Williamsport, Pennsylvania)參與比賽，先後擊敗了來自加拿大與美國北區的代表隊，最後在冠軍賽中擊敗代表美國西區的夏威夷隊，終於登上冠軍。

這是來自中華民國臺灣的球隊參於該聯盟各級比賽中所得到的第一座冠軍，自然具有特殊意義。可以想見的，金龍少棒的優異表現自然引起了國內報紙的熱烈報導，一時有關金龍隊新聞消息大舉攻佔了報紙的主要版面；事實上，當時國內各重要報紙，早從球隊選訓開始就已經非常關切；在球隊赴美比賽的過程中，有能力的報社甚至派遣記者隨行、或從美國調駐美特派員進行採訪。在這段過程中，各報也逐漸發展出一套共有的模式來處理新聞：從最早的選訓過程，就要建立對球員背景或球隊實力基本輪廓的介紹；賽前報導戰情蒐集的結果；比賽後則鉅細靡遺地報導比賽具體經過、球場花絮、現場觀眾與國內觀眾球迷的反應、以及國內政壇各官長對於比賽的回應或賀電；在比賽前後還要報導小球員的生活點滴；球對載譽回國後，則要報導球員的歡迎儀式與密集的官式拜會行程。最後，記者和主筆們對於比賽意義的理解與發微，也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透過耙梳這些豐富報導內容，筆者提出一點與本文研究目的有關的最基本觀察：在金龍隊獲得世界冠軍的相關報紙新聞論述中，的確充斥了國族主義話語。而這些話語中可以歸納出一些值得分析之處，以理解這些話語之脈絡意義。

第一個，還是想像主體的問題。

按照當時的論述，獲得冠軍的臺中金龍隊等於是中華隊。這個「中華隊」名詞的出現去取代之前的「中國隊」稱謂，固然跟當時中華民國在爭取國際體育競技場上的「中國代表權」爭取上逐漸落居下風有關；以「中華」取代「中國」，有其政治考量。但就「中華」兩字的字面意義而言，與過去在現代主權意識還沒有在傳統中國發生影響時，與「中國」兩字的文化意義相同，都是指涉文化最高的領域，而傳統中國人族群就根據這種文化主義的原則來進行自我的認同與想像。由是，「中華隊」一詞固然有政治退讓、而有目的性的進行自我區別，以明「中華隊」是來自於「中華民國」的隊伍；但即使名之為「中華」，無礙於其背後的文化或族群意義，仍可以藉由文字的描寫或敘述，將其連結到一種「中國人」的主體想像。

如《聯合報》的特派員施克敏就對於小球員的住的環境，有以下介紹：

綠林裡那幾幢營房，大門前都綴著紅、藍、白星條旗的垂幟，門上各掛著一個英文字牌，標明世界少年棒球聯盟各洲區的區名，成了各地

遊客獵取紀念鏡頭的標誌，每年這季節，那裡面總是那樣熱鬧，洋溢著少年們的歡笑，今年如果和往年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那幢標明 PACIFIC（太平洋）的營房[編者按：當時金龍隊是以世界少棒聯盟太平洋分區的冠軍資格，晉級到在美國賓州威廉波特舉行的世界少棒賽。]，換了主人，新主人是十四位活潑的中國少年棒球員。³⁴

《中國時報》也有這麼一則花絮報導：「連日來，中華少年棒球隊的隊員無論走到那裏，都被仰慕的人擁簇著。他們不斷地向少棒隊豎起大姆指：『China is very good!』」³⁵

不但如此，這種「中國人」的想像還會被導引至「中華民族」或「炎黃子孫/黃帝子孫」的政治迷思。如《中央日報》隨隊採訪的王宗蓉在回顧這個行程時，有感而發：「廿四天，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對載譽榮歸的中華少年棒球隊來說，訪美的廿四天，不僅僅是他們人生旅程上的一串光環，對整個中華民族，都是光輝燦爛的一頁。」³⁶《臺灣新生報》的社論則盛讚小國手：「他們在運動場上的良好風度，更使國際人士對中華民族的新生代，刮目相看。」³⁷《自立晚報》的編輯則是在引用中央社的電稿時，加上了這樣的一個副標題：「陳[智源]小將宣誓盡其在我，海外炎黃子孫如醉如狂」。³⁸

在意義上，「中華民族」此一概念，就是強調漢滿蒙維藏五族共治而為一大的「中華民族」，原來就帶有國族建構過成所必要的「整合」意義。而「炎黃子孫」或「黃帝子孫」的概念，則某程度與「中華民族」互斥，因為這帶有中國人係「一元性」的族群的假設，但卻得以在根基論的國族主義典範仍然具高度影響下，使中國人族群找到一種同血源的客觀特徵。然而，無論是「中華民族」、抑或「炎黃子孫/黃帝子孫」的說法或觀念，並不存在於十九世紀晚期以前的中國社會，而是在十九世紀晚期之後，當歐洲式的民族主義逐漸在中國產生影響時，被當時的知識菁英經過將國族論述重新編碼而創造出來的政治詞彙。³⁹「中華民族」、或「炎黃子孫」被提出——或者說是被發明出來——並進而成為在廿世紀、

³⁴ 施克敏，〈身臨戰地·又如露營，中華小國手威城生活〉，《聯合報》，1969年8月23日，第三版。引述文字中之粗體和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

³⁵ 佚名，〈我少棒隊揚威海外〉，《中國時報》，1969年8月23日，第二版。

³⁶ 王宗蓉，〈金龍遠征側記(一)〉，《中央日報》，1969年9月9日，第三版。

³⁷ 臺灣新生報(社論)，〈我少年棒球隊榮登世界王座〉，《臺灣新生報》，1969年8月25日，第二版。

³⁸ 傅建中，〈威廉波特棒球場，青天白日旗飄揚〉，《自立晚報》，1969年8月24日，第一版。

³⁹ 以上問題可以參見沈松橋的兩篇作品：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期，1997，頁1~77；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期，2000，頁77~158。

乃至於廿一世紀在華人社會的一種具支配性之政治迷思的過程，其實適可以成爲一種案例去驗證葛爾納(Ernest Gellner) 認爲「國族主義先國族而存在」、⁴⁰霍布斯邦說「國族主義創造了國族」的假說。⁴¹至少，由當時的新聞論述中，在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的臺灣社會還沉溺於這種政治迷思。

第二，小球員在棒球場上的成就，被聯結到國族的「能力」或「自信」之上。

正如筆者於本文上節所揭櫫的：在紅葉熱的時期，報紙新聞論述對於紅葉隊暨中華聯隊擊敗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隊之意義的評析，仍然將核心的關懷置於這一系列的勝利對於未來國內棒球運動發展的可能影響上，並帶有熱切而正面的期待。這種原初的關懷，雖然隨著這座世界冠軍而得到初步的滿足，而且也引發了新的期許。試看一下段落：

以我中華民族的秉賦與能力的深厚，祇要大家能認識體育的重要性，群起提倡，多比賽，求普及，從根基上下工夫，實不難在體育方面並世各國，一爭長短。⁴²

自從去年五月台東紅葉隊一鳴驚人，給少年棒球開創了新氣象之後，如今不過短短一年，中華隊突然以「黑馬」姿態，上月在太平洋區預賽中一舉擊敗棒球王國之一的日本，如今在世界錦標賽初賽中又一戰淘汰實力強勁的加拿大。這足以顯示，將相本無種，任何體育運動，中華兒女都有潛在的適應能力，問題只在有無有心人加以發掘培養。

43

也就是說，這種期待變成了發展「全民體育」的期待，而不僅局限於棒球的領域。

除了論證金龍隊的冠軍成就與族群成員的運動秉賦與能力外，當時的新聞論述還進一步地論證運動場上的成就能證明「民族能力」。如《自立晚報》早在該隊擊敗日本取得太平洋區冠軍時，就分析「我們下一代的智力與體能，足以與世界上任何民族相抗衡」這一事實就是使「我國倉卒成軍的少年棒球隊，竟能以雷霆萬鈞之勢，在日本舉行的預賽中贏得決賽權」的理由之一。⁴⁴且再看《中央日報》社論的分析：「從紅葉隊精彩表演起，到中華少年隊上月底渡海東征，取得太平洋區的代表權，又匆匆移軍赴美，三戰定鼎，其間只是短短一年多時間，能

⁴⁰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p. 48~9.

⁴¹ Hobsbawm, Eric, p. 9.

⁴² 中央日報(社論)，〈我國體壇的一件大事〉，《中央日報》，1969年7月31日，第二版。

⁴³ 聯合報(社論)，〈從中華少棒隊初捷談振興體育之道〉，《聯合報》，1969年8月22日，第二版。

⁴⁴ 自立晚報(社論)，〈少年棒球隊捷報的啓示〉，《自立晚報》，1969年7月31日，第一版。

有如此卓越的進步與表現，充分顯示了我中華民族的智慧與體能實力。」⁴⁵因為對自己的族群的能力有了新的體認，連帶還意識到國族的自信與自尊，遂有以下的論述：

因為美、加兩國的代表對都較我們高大。但這一事實正說明中華少年的優秀，是智慧的勝利，是技巧的勝利，少年棒球隊的光榮成就，增加了我們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我們能不興奮？⁴⁶

金龍隊和世界第一流的球隊交手，連戰皆捷，為國家爭得了光榮，為民族恢復了信心，展望未來，還有光明燦爛的遠景。⁴⁷

由少年棒球隊的橫掃世界少年棒壇，獲得一個有力的證明，中華民族是優秀而堅強的民族，祇要我們有所作為，必為世界人們所側目……⁴⁸

等到我隊以五 A 比零戰績擊敗美西區隊的消息傳抵此間後，整個臺灣更沉浸在一片歡樂聲中。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聲音，夾雜著爆竹和鑼鼓聲，衝破了凌晨的寂靜。這證明著正邁向現代化路程的我國，有著堅強勇敢而又極富潛力的年輕一代；也有著全體力爭上游、熱忱愛國的人民。就憑這一點，我們看見了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偉大精神，也看見我們國家光輝耀眼的錦繡前途！⁴⁹

也由這些成就，增進了我們的勇氣和信心，中華兒女的體能和智慧，決不遜人。⁵⁰

這類論述則是有脈絡可循的。在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國族主義與體育政策的施行一直有所牽扯，最早當然是延續其大陸時期的做法。根據一九四一年制訂的《國民體育法》第一條，發展國民體育就是「以鍛鍊國民強健體格，培養民族正氣，達到全國國民具有自衛衛國之能力為目的」。這種政策內涵之產生，則與一種源於十九世紀末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對身體文化的認知有關。蓋中國現代體育觀之啓蒙，適於十九世紀末期中國處於瓜分豆剖的危機。嚴復(1853~1921)在以天演論的觀點探討中國的富強問題時，就指「民力」與「民智」與「民德」一樣，為有生之物「保生」之法則，而力主要「鼓民血氣」；他論證指出「今之中國，

⁴⁵ 中央日報(社論)，〈中華少年棒球隊的啓示〉，《中央日報》，1969年8月25日，第二版。

⁴⁶ 台灣新聞報(社論)，〈迎中華少年棒球隊凱歸感言〉，《台灣新聞報》，1969年9月9日，第二版。

⁴⁷ 佚名，〈建立棒球場〉，《中央日報》，1969年9月16日，第三版。

⁴⁸ 自立晚報(社論)，〈一棒激起雄風，賀中華少年棒球隊榮膺世界冠軍〉，《自立晚報》，1969年8月24日，第一版。

⁴⁹ 自立晚報(社論)，〈歡樂中的警惕〉，《自立晚報》，1969年8月25日，第一版。

⁵⁰ 佚名，〈再接再厲開創新局，爭取棒球王國榮譽〉。

非猶是病夫也耶」，又以爲「今夫人之身，惰則羸，勞則強，固常理也」，而「今者論一國富強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體力爲之基……是以君子小人勞心勞力之事，均非氣體強健者不爲功。」⁵¹由此可知，中國現代體育觀點自始就與在「保種」、「強國」的要求以及社會進化論的論述結構之下發展，無怪乎體育發展就帶有工具性的任務。⁵²同時，這種「病夫」觀點成爲民國初年中國知識份子對自己身體文化的一種集體認知。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陳獨秀(1875~1942)就批評當時的中國青年，「千萬之中，鮮有面紅體壯者，以致被稱東方病夫，如此民族將何以圖存」，⁵³「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國民，將何以任重而致遠乎」。⁵⁴因此，洗刷國族爲「病夫」的污名，也是當時體育觀點的重心，之後遂有王正廷(1882~1961)的《體育救國》，認爲要藉體育「泯除外人對我民族為一盤散沙之譏」、「可改善惡習、好逸惡勞、吸食鴉片、酒色煙賭，以剷除民族劣根性」。⁵⁵王正廷並主張多辦運動會，而運動會之功能則在發揚民族精神與培養個人之身體，由是，王氏乃將「運動」競技與民族強弱做了聯繫。⁵⁶

如果我們看以下兩段摘自當時《中央日報》社論中對於體育意義的闡釋，就可以理解到，其對於體育暨運動競技與國族之間的論證與以上源自於中國近代化過程的所發展出的身體文化認知是有聯繫的。

體育關係國家民族的盛衰，環顧世界各國，其國勢的強弱，幾乎與其體育發達的程度成正比。我們今天致力民族復興、文化復興，提倡體育實為最重要的一環，因為體育不僅鍛鍊體魄，而且培養公平競賽、團結合作的精神，這種精神實即是現代民主生活的根源。⁵⁷

國民體育與運動的競賽，是最好的公民教育之一，對於培養團隊的精神，提高責任感與榮譽感，以至陶鑄國家民族的意識，都是非常有效的途徑。⁵⁸

同時，前引段落的文字中出現如「適應能力」、「優秀」、和民族「生存」詞彙，也可看出這種論述仍然陷於社會進化論的優勝劣敗的框架中。另外，從以下《自

⁵¹ 嚴復，〈原強〉，《嚴幾道詩文抄》，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1974，頁24~66。嚴復的〈原強〉原發表於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至九日的天津《直報》上，此版本爲其修訂稿。

⁵² 參見：許義雄，〈社會變遷與學校體育〉，收入許義雄等著，《運動教育與人文關懷(上)》，臺北市：師大書苑，1998，頁1~35；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新史學》，7:4，1996，頁119~158。

⁵³ 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青年雜誌》，上海：群益書社，1:2，1915，頁127~132。

⁵⁴ 陳獨秀，〈新青年〉，《新青年》，上海：群益書社，2:1，1916，頁7~10。

⁵⁵ 王正廷，〈體育救國〉，《時事月報》，南京：時事月報社，9:4，1933。

⁵⁶ 同上註。

⁵⁷ 中央日報(社論)，〈我國體壇的一件大事〉。

⁵⁸ 中央日報(社論)，〈中華少年棒球隊的啓示〉。

立晚報》的採訪稿中當時全國體協理事長楊森的感言，也說明「洗刷國恥」或洗去自卑的情結，仍是當時體壇一種重要的價值：「最重要的是國人對於國際性競技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將因而消失。因為他們將發現，中國人再也不像想像中那樣，永遠差白種人一大截。」⁵⁹以下的評論，也是反應同樣的心理：

因為每個中華兒女，多少年來，心坎深處所潛在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委屈者久矣。這次台中金龍隊，雖然只是在世界少年棒壇上贏得冠軍，但十四位中華小將，有此奮戰精神，有此突出表現，在某種意義上，無疑的使我們大家為之揚眉吐氣。⁶⁰

至於《自立晚報》的論述就更直截了當：

這次中華棒球隊榮獲世界少年棒球賽冠軍，不僅為我們國家爭光，而且為我們民族雪恥。過去中國人在體態和體能上，都顯得不如人，其在體育和運動方面，更少能在國際上創下紀錄，取得榮譽。因而竟被人稱為「東亞病夫」。這個譚號，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恥辱。……而這次中華少年棒球隊所表現的，不僅顯示我們下一代的中國人具有優越的體態，充沛的體能，而且在體育活動上具有高度的團結精神；……他們的勝利，他們的光榮，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也可以說，他們的勝利與光榮，是國家的，是民族的！⁶¹

此外，另有一類的論述在肯認自信心之餘，還特別強調金龍隊成就的原生性：

中華少年棒球隊之所以可貴，就因為他是純國產。近百年來，我民族國家最大悲哀，莫過於失去自信心。以為什麼都不如人。……此次少棒隊能使久以棒球為國球的日本稱臣，能以棒球王國自豪的美利堅敞開白宮之門邀去做上賓，真可說是自己的沃壤中生出了燦爛的奇葩！

⁶²

這種對原生性成就的強調，就又帶著向文化霸權進行文化抵抗的隱喻。

⁵⁹ 佚名，〈眼看冠軍在望，真是開心極了〉，《自立晚報》，1969年8月22日，第二版。

⁶⁰ 聯合報(社論)，〈熱淚迎得小將歸〉，《聯合報》，1969年9月7日，第二版。

⁶¹ 自立晚報(社論)，〈可「慰」而不可「勞」，如何歡迎少年棒球隊凱旋〉，《自立晚報》，1969年9月6日，第一版。

⁶² 方駿齡，〈下一棒應該如何？恢復我們的自信心，從少年棒球隊贏得世界冠軍談起〉，《自立晚報》，1969年9月1日，第八版。

第三、比賽以及冠軍都被認為有凝結人心的作用。

試想八月廿四日那一天，全美國在球賽現場和電視機旁中國留學生和華僑，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升上冠軍旗桿，而潸然淚下的情景；以及我國內同胞通宵達旦收聽比賽進行新聞，而在捷音傳出後鞭炮響徹全城的正歡，其所發洩的國家民族之思，遠超越了那一場五 A 比零的冠軍光榮感。⁶³

力戰經營，始終不懈！這樣的演出，不僅海內外同胞，如癡如醉，激動的情緒無可形容……⁶⁴

這兩段引述，足以說明當時的新聞論述如何去說明一場比賽的勝負如何能作為凝結人心的觸媒。

事實上，運動競技被認為有凝結國族人心的作用，一方面是因比賽有勝負，勝負之間就會激發群眾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另一方面，在運動場上會出現若干國族符號，例如國旗、國歌、有特殊色譜的球員制服、以及現場的加油標語等，可以讓群眾去依附其國族認同。

海外現場中國觀眾反應則特受中國國民黨黨營的《中央日報》重視，甚至還以顯著篇幅刊登了一封海外讀者來鴻來說明當時的情況。這篇署名周友蘭的作者特別強調：「八月二十日，是美國賓州威廉波特中國人最光榮的一天，因為，『我們贏了！』」渠細述了中國人如何湧入使整個體育場「幾乎成了中國人的世界」，並描述在現場觀眾海外看到祖國國旗、聽到祖國國歌的感動：

接著，莊嚴雄偉的中國國歌聲，飄揚在會場各角落，每一個中國觀眾肅立著，臉上都映現著驕傲、感動。有的人喜極而泣，一位女觀眾抱著頭在哭，還有的任由淚水流在面頰上，也有人悄悄的拭去淚水。……也許，在座的中國人有很多是第一次在國外公共場合中，看到我們的國旗，聽到我們的國歌。在國內不覺得什麼，在國外，却能深深體會到國旗、國歌就是代表了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而我們每一個人也以身為中國人為榮，異鄉的遊子又何嘗有一刻忘了他們的祖國啊！⁶⁵

這篇來鴻，不啻提供一個現實的經驗，去說明運動競技場上充斥的國族符號的確使群眾得以依附其國族認同；另一方面，這篇來鴻同其他的相關報導變成報紙的鉛字時，等於又重新播放了一次這些國族符號。

⁶³ 聯合報(社論)，〈熱淚迎得小將歸〉。

⁶⁴ 中華日報(社論)，〈震撼全球的偉大勝利〉，《自立晚報》，1969年8月25日，第二版。

⁶⁵ 周友蘭，〈春雷初動——在美國賓州威市看中華少棒隊初賽記感熱淚迎得小將歸〉，《聯合報》，1969年8月25日，第三版。

四、結論

今年適逢金龍少棒隊取得世界少棒聯盟冠軍四十週年的紀念；而這近四十年來，臺灣的棒球運動發展與國族主義形成糾結，已經在學術圈內或棒球文字工作者的論述中成爲一種定見。在這些過去、幾以巨視角度出發的觀察與研究中，既強調了國族主義覆蓋住了臺灣近數十年棒球運動的發展，但卻也不得不承認：棒球比賽、特別是牽涉到國家隊所參與國際比賽，也形同一種群眾儀式或集體祝祭，使得「認同感」得以依附於「共同體」或「族群」之上。⁶⁶這些的研究論點使對臺灣近數十年棒運史或延伸性的研究得以被賦予了其在社會與文化脈絡上的意義。

本文所進行的微觀研究結果，當然再一次指出了臺灣的棒球運動發展與國族主義之間的糾結關係，也坐實了從少棒熱伊始，相關的新聞報導就充斥著國族主義的情緒與話語。這一方面本來就是因爲運動比賽既攸關勝負，就會激起愛國主義；同時，考察這些國族主義話語的論證脈絡，並非是植基於一種對於國族問題的全新理解，而是延續了過去源自於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對身體文化的認知，適因新的社會情境的發生而大量地被重新生產。

最後，在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下，這些國族主義話語中存在共同的「中國人」主體想像，但不能忽略地是此一成就之所被造就或產生的政治地理空間因素。《自立晚報》的社論就約略提及「棒球在台灣」有「相當的歷史與基礎」此一前提；⁶⁷該報記者吳豐山則也敘述以下事實：「棒球運動在台灣風行已久，在這個南北八百里，東西兩百里的海島上，棒球是一項普遍的運動。」⁶⁸在當時，棒球運動興盛與具有基礎的既然是臺灣一地；而中國大陸的棒球運動發展過程與經驗，同臺灣相比，其實又並非經歷同樣的路徑。這就形成了一種時間與空間的割裂。具體的空間感對於國族邊界的想像其實具有決定性。⁶⁹如此，棒球運動在一個時間兩個空間的不同發展歷程，就得以成爲用於想像差異的主觀條件。《自立晚報》這看似天外飛來一筆的論述，也就成了對未來在臺灣「棒球國族主義」

⁶⁶ 試舉其中專門探討此問題的代表性作品：晏山農，〈新認同的配方——台灣棒運的「力脫死」及其顛覆〉，《中國論壇》，32:10，1992，頁32~36；楊照，〈抽離了民族主義之後〉，《中國論壇》，32:10，1992，頁37~40；張力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新竹市：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⁶⁷ 自立晚報(社論)，〈一棒激起雄風，賀中華少年棒球隊榮膺世界冠軍〉。

⁶⁸ 吳豐山，〈中華立國五千年，幸有奇兒開紀元；幸喜今日，一棒揚威萬里傳〉，《自立晚報》，1969年8月24日，第三版。

⁶⁹ 如安德森認爲「想像的共同體」在本質上是有限的，具體的空間界線就成爲可讓認同想像依附之物。渠於論證第一波國族主義——美洲的克瑞奧里式國族主義(creoles nationalism，或譯爲海外移民式的國族主義)——時，殖民邊界與共同歷史經驗的重合，使新的群體想像成爲可能。見：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Chapter 3。

發展的一種伏筆。